

透视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马俊峰

(西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它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偏离,影响了西方“马克思学”,而“马克思学”进一步肢解或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性,这是值得关注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马克思学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0)02-0116-05

近些年,西方“马克思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学者们针对“两个马克思”、“两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罪性等问题进行了学理论证,试图把此问题合法化。但是,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学”制造的这种“学术神话假象”是在肢解马克思主义,他们通过差异分析方法,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解构,从而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此证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具有优先性和时代性。可以说,“解构”就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主旨,为此,通过对“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剖析,阐释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以便使我们能够客观地对待西方“马克思学”,防止盲目崇拜“马克思学”,捍卫而非削弱马克思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一、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

西方“马克思学”制造“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立”,其目的是反马克思主义。它们这些思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当它们返回马克思文本进行文献考据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文本解读和诠释的影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可划分为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划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统一性遭到质疑,这为西方“马克思学”进一步肢解或解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口实和说辞。为了澄清西方“马克思学”的实质,必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持有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切入,只有这样,才能认清西方“马克思学”产生的背景、逻辑后果与问题的实质。

恩格斯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与列宁对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强调,被一些人歪曲为与旧唯物主义没有区别的自然主义和教条主义,认为恩格斯和列宁等人脱离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立场,甚至有些人直接指责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否定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屡屡失

收稿日期:2010-09-23

基金项目:本文是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项目号:NWNU-KJCXGC-SK0303-13)和2010年度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俊峰(1969~),男,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败,一些人开始重新思考和解读马克思的文本。由于第二国际和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而卢卡奇、科尔施等人的学说被看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学说,后来就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超越教条主义和消极无为等旧唯物主义,但他们受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片面学说的影响,利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混淆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原则界限^[1],这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由于对马克思文本解读和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想法不同,形成了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有: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萨特、戈尔德曼、巴罗、艾温纳里、乌龙多、底特律的“新闻和文学”小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霍克海默、阿多诺、纽曼、洛温台尔、弗罗姆、本杰明、马尔库塞,以及这个学派的第二代成员维尔默、施密特和哈贝马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沃尔帕、阿尔都塞、普兰查斯、戈德里埃、格吕克斯曼、贝特兰、特尔博恩和英国《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布拉克伯恩。

首先,从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各自特征来看,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遵循着马克思早期《1844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连续性,强调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对现实批判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劳动异化”构成他们价值评判的标准,从人与现实的“异化”状态切入,通过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扬弃“异化”状态,进而恢复人的本质。而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科学地指出资本家在无限制追求剩余价值的同时激化了资本主义自身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灭亡,而社会主义必然会取得胜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科学马克思主义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倡导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发生了与黑格尔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在这个意义上,科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1844年手稿的“意识形态的”人本学作为自己内容的构成部分。

其次,从意识形态的视野来看,科学马克思主义把意识形态看作是对世界的歪曲反映,主张以“结构主义”方式描述意识形态,提出结构的意识形态,以此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使

人“异化”,主要取决于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同资产阶级一样成为压榨和剥削工人的帮凶,致使科学技术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合理性的工具。科学技术一旦成为意识形态,它就具有了隐蔽性,同时,它依靠自身的强大功能说服人们,这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就屈从它,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极力批判这种情形。特别是哈贝马斯还提出一种人道科技观,试图改变科学技术继续“异化”人的状况。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理性已经变成工具理性,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它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是无法摆脱它的控制的。可以看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差别,反应了那些把马克思看作德国唯心主义的顶峰的人们和那些马克思超出这个传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因此,这也是那些认为青年马克思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和那些认为青年马克思还是陷在意识形态泥潭的人们之间的差别”^{[2](P220)}。这种“差别”意味着,批判马克思主义承认,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而科学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差别,承认老年马克思已完成了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飞跃。

再次,从认识论角度上讲,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仅仅注意社会容易变形的历史主义,一种要求对事件进行前后关联的解释的有机论;相反,科学马克思主义寻求反复发生的、离开前后联系的、能辨认的稳固的社会结构^{[2](P221)}。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稳固的“社会结构”、确定而不模糊的认识方式、明晰的认识界限,相应地,他们反对“模棱两可”的价值。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划分为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经济基础和包括意识形态与国家的上层建筑,坚持前者控制后者。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喜欢使用“总体”概念,拒绝对社会做两分法,认为那样是一种庸俗化的做法,他们有一种强烈追求统一的、共同的欲望,声称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理解太狭隘了。由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两种结果:进化论和灾变论。

最后,从主体和客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看,批判马克思主义者更强调人这个主体在历史发展之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他们所倡导的历史观是不连续的、突变的、灾变的;相反,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以客体为中心,把变化看作是一系列自然形式,因此,他们所倡导的历史观是逐渐的、进化的和连续的,认为社会发展是“结构”自然变化的产

物。可以看出,科学马克思主义者是把自然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认可科学技术在人们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自然和人道主义文化相联系,特别是卢卡奇、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极力批判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作用。卢卡奇指出:“当‘科学’认为这些‘实事’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实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13](P55)}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从“实事”出发,用纯粹数量、数和数的关系表现事物的本质,他们对事物缺乏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

二、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差别,导致他们持有两种不同的政治观。强调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极力倡导一种价值的东西,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觉悟、内心精神或革命的目的。批判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人们的革命意志。在批判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同技术和武器相比,人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不必等待其他力量的成熟就应该积极采取行动。批判马克思主义强调勇敢和政治觉悟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可以不依靠对象化的历史、社会结构,而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意志和觉悟就能够克服自然界、历史和社会经济结构的不足。在这个意义上,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未来依靠的是清醒的觉悟和坚强的信仰,是能够由勇敢者铭刻在历史上的意识,批判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使命在于保护革命目的和革命热情。这样,批判马克思主义强调为了实现革命目标“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而很少提及和重视任何先锋队的政党在革命中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阶级应该承担何种历史使命,忽略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先具备某些客观的历史条件,最终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冒险主义或革命救世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放在与意志论的斗争上,极力贬低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革命意志,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科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养成政治上的耐心,训练和培养干部以待时机成熟,精确地估价真实历史条件,不把现实同愿望混淆起来。尤其是,他们想方设法保护他们未来

在客观条件许可有更大成功机会时进行活动的的能力。他们把最大的信赖放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机会和矛盾上”^{[12](P225)}。科学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在于保护组织工具及其未来选择。他们为了保护手段、组织工具、先锋党,宁可放弃社会主义和革命所寻求的解放目的。这导致的政治后果便是“仪式主义”或者“修正主义”,这就是说,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样,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信赖社会进化,这种进化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结构发展使然,因此,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社会结构解决历史问题,认为政治是一种副现象,会自动适合生产方式的变化。这就是说,只要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成熟,社会主义社会会自动地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不需要人为的努力和牺牲,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种观念所导致的后果是:削弱了人民的革命意志,产生了一种渐进的、议会式的社会主义^{[2](P227)}。

三、两种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启示

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蕴含着“两个马克思”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批判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宗旨,宣称“青年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成熟”,声称这时期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把异化理论看作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在他们看来,“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贫乏、简单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根本症结在于失落了异化这个根本”^{[14](P152)},因为异化理论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5](P61)}“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成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5](P67)}。因此,“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15](P63)}。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概要表述为理论依据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

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9](P412~413)}科学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结构出发,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并把“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认为“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发展进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歪曲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马克思主义,都不能客观地、公正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挖掘“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思想,试图克服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在抬高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同时,相应地贬低了马克思后期思想在整个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作用。科学马克思主义虽认同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但由于他们对恩格斯关于维护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错误认识,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上只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而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起来,形成一种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认为这条路线脱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观念。其实,这种认识在我国学界也存在着广阔的市场,有学者就此提出“异质性差距论”,有学者利用“差异分析”方法,从学理上试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合法化。事实上,这些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影响的体现,这也与西方“马克思学”在我国学界的兴起紧密相连。

“马克思学”是法国学者吕贝尔在上世纪50年代创立的,其手法是制造“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以便达到反马克思主义和解构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的极端化、夸张化,力求以此来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马克思学”似乎重新理解马克思,寻求解救西方社会发展危机之路。他们解读马克思、阐述马克思的同时深深地打上资产阶级价值或精神的烙印。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生规模庞大的学生和工人运动,西方“马

克思学”得到很大发展,这一时期著述颇多,比如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阿隆的《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本得尔的《对马克思的背叛》、莱文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吕贝尔的《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费彻尔的《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等。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学”的终结,因为“冷战时代,他们紧迫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这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战争’的背景下官方的一种学术牵引力所致,冷战后,包括官方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趣都开始下降,势必冷落了西方‘马克思学’。如今时代已经告诉我们,西方‘马克思学’已经终结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依旧充满活力,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时代已经到来了”^[7]。国内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为马克思辩护”,他们返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力图克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一致,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作为“我们的问题”,是值得关注和重视的。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化出来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一定的歪曲和偏离。而西方“马克思学”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极力地夸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大力鼓吹“两个马克思”,其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马克思主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并不是一无是处、或者毫无价值的,它们至少给我们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一样是躲到象牙塔里,进行文本解读或文献考证与解释,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时候,歪曲和偏离甚至肢解或解构马克思主义。他们主要是由一批知识分子组成,不再把如何“改造世界”作为他们自身的使命,而是注重如何解释世界,他们基本上丧失了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的现实关怀。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是在西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欧各国革命失败,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和反思“革命失败”的原因。他们认识到,要纠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缺乏和简单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错误。为克服教条主义和消极无为的旧唯物主义的弊端,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走上了歪曲和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道(下转第138页)

在小说文本里的处理方式、还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历史意识如何被赋形为独特的历史话语,这些值得深入思索和探求的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有效研究。因此在尝试以上研究的同时,在从史传语义、体别梳理、显露的叙事诗学方面考察了文章分类学意义下的“史传传统”后,最终的落脚点仍是要关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这就绝非一个或几个西方小说理论即可以涵盖的。扩而大之,在研读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与古代小说评点的过程中,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理论框架与小说阐释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这种距离的存在难道仅仅是因为理论不能完全概括文本所能解释的吗?如果说当代文学自确立之时,其中的小说批评就是一个吸纳了很多文学和非文学因素的机体,比如17年时期、“文革”、80年代,而90年代以来又有形式上和理论上的变革,那么对古典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的承接似乎还不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当代小说文学资源建构的考察还没有被真正纳入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中;而在传统缺失的研究语境里,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古代小说研究者

的术业有专攻,它更是当代文学的小说研究者对当代小说的文学资源进行逆向回溯研究时不能回避的关节点,如此,才是对中国小说传统及其历史延续性的确认与整体观照。

参考文献:

- [1]陶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 [2][宋]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4][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
- [6]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M].上海:三联书店,1999.
- [7][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8][晋]杜预,等.春秋三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9]汪荣祖.史通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姚雪垠.无止境斋书简抄(二)[J].社会科学战线,1981,(1).

[责任编辑:谢雨佟]

(上接第119页)路。西方“马克思学”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受官方所支持,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或解构马克思主义,他们极力肢解或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很明确,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战争”最终赢得胜利。但不管怎样,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研究成果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后,对中国学界摆脱苏联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提出了一些研究主题,比如,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研究、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律的研究、马克思思想渊源的研究、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研究、马克思与唯物史观的研究、马克思与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等^{[8](P45-127)},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深化与拓展了马克思思想研究的领域,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是在西方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他们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不再以“改造世界”为宗旨,因此,他们的理论或者是表现为改良的政治路线,或者就是为资产阶级

统治进行合理性论证。当我们在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时,必须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坚定的政治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既克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多样化;既创造理论的丰富性,又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既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又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 [1]刘放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J].求是学刊,2004,(5).
- [2]马列主义研究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3辑).
- [3]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4]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7]孙亮.解构:西方“马克思学”一个主导原则[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7,(4).
- [8]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谢雨佟]